



基于帕尔默文化意象理论的概念隐喻跨文化 差异与翻译研究

吴海波

(海口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 福建, 南安 362332)

Inter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translation of conceptual metaphor based on Palmer's cultural image theory

Wuhaibo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aik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an, Fujian 362332)

Abstract: metaphor is one of human cognitive means. It is not only a language phenomenon, but also a human way of thinking. The idea of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originated from the Book Metaphor on which we live. The emergence of this theory has greatly promoted the progress of cognitive semantic teaching. Palmer pointed out in his cultural image theory that metaphor and culture are closely linked. In the world, the deep culture of all nations is mostly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through metaphor.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have both similarities and unique parts.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Palmer's cultural image theory to analyze conceptual metaphor and its transl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in order to provide relevant reference materials for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Keywords: Palmer; Conceptual metaphor; Cultural image theory; Cross cultural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摘要: 隐喻是人类的认知手段之一, 它既是一种语言现象, 也是人类的一种思维方式。概念隐喻理论的思想最早源于《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 该理论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认知语义教学的进步。帕尔默在其文化心象理论里曾指出, 隐喻和文化存在着极为紧密的联系, 在世界上, 各民族的深层文化大多是通过隐喻来传承和发展的, 中西方文化既有相同之处, 也有独特的部分, 本文将着重借助帕尔默文化心象理论来剖析中西方文化异同背景下的概念隐喻及其翻译, 以期为外语教学事业提供相关参考资料。

关键字: 帕尔默; 概念隐喻; 文化意象理论; 跨文化异同

一、前言

“文化语言理论”这个词最早在《文化语言学理论构建》这本书里出现, 该书作者是美国知名语言人类学家加利·帕尔默。书中, 帕尔默首次把民族语义学、博厄斯派语言学以及会话民俗学这三种传统学识和认知语言学相融合, 从而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化语言理论^[1]。此理论在后世被称

作文化心象理论。帕尔默的文化语言理论主要以意象作为核心概念, 借助意象这一概念, 人们能够观察和理解各民族语言使用者的思维模式与内心世界^[2]。此外, 帕尔默还曾把文化语言理论的存在意义和人类命运结合起来阐述, 他觉得世界并非完美存在的, 而是一个充满缺口和伤痕的世界, 需要人类不断对其进行修复和弥补, 而且这



个世界需要更多的跨文化、跨种族的理解与包容。在修复世界的过程中,文化语言能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隐喻要依靠实际存在的意象来创造新的意象,概念隐喻由前人的意象衍生而来,对于隐喻,意象主要起规范作用,隐喻和意象是同构关系,经过漫长的演变与融合,人类的世界观意象开始逐步修正,新的隐喻和意象已然产生,组合成了一种新的文化语言^[3]。世界上存在着众多民族,各民族的生活地域不同,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也有极大差别,这种差别在岁月流逝中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意象取向,中西方的差异尤为显著。比如中国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传说中,“蝴蝶”代表忠贞的爱情,是美丽的生物,但在西方国家,蝴蝶却被认为是代表轻浮的物种。再如常出现在西方奇幻小说故事里的“猫头鹰”,向来是智慧的象征,但对中国人来说,猫头鹰的出现却代表着凶兆;中文词汇“拦路虎”在英语中被翻译成“lion in the way”等等,这些概念隐喻的差别十分常见^[4]。

二、文化意象与概念隐喻跨文化共性的形成机制

把人体部分当作本体开展的概念隐喻带有一定的文化意象,这种隐喻在中文和英文里都能找到相关用法。像汉语“插足”在英语里翻译为“have one's foot in”,“洗手不干”译成“wash one's hand of”。这种以人体部分作为隐喻的方式既形象又生动^[5]。多年以前,人们为了描述自己要认知的事物,常常会用自身的人体部分对该物体进行隐喻,并组织成相关语言,这样的表达既能被本土人民接受和认可,也能被其他民族理解,如此一来,两者间就产生了同一种认知新事物的方式。在时间的推移和作用下,部分名称开始有了固定的语言形式并完整保留下来,这些由文化意象形成的概念隐喻在形成过程中就成了文化的一部分。在一些具备跨文化共性的概念隐喻中,还有以人体作为指称平台的隐喻语句。在人们的思维模式里,普遍觉得高比低好,上比下好,所以高和上通常都作为肯定的词汇运用,比如汉语中的“高姿态”“高水平”,英语里“wake up”“high on the ladder”等。在中国古代,右方位常被视作尊贵的象征,地位

高的人或尊贵的客人往往会被安排坐在右边,也有汉语说“无人出其右者”,就是表示尊贵和权势极大。在英语中,右方位也常用来表示肯定的意思,如“my right-hand man”等^[6]。此外,具有跨文化共性的隐喻还体现在以人体作为容器的方面,英语里人们习惯把人体比作容器,例如“she is filled with love.(她充满爱。)”“He is filled with anger.(他充满愤怒。)”等,当情感在人体这个容器中满得要溢出时,英语就会用“pour”来表达。而在汉语中,对于人体所蕴含的情感,像生气这个概念隐喻,通常会用“忍气吞声”“满怀怨气”等词语来表达。人们认为,人体中存在的“气”太多时需要宣泄,比如叫人“消消气”等^[7]。

由于生活在同一星球,人们看到的自然环境虽有差异,但大体相同,所以,人们习惯用自然界里存在的事物进行一些概念的隐喻,在隐喻过程中也可能采用隐喻的本体来表达。比如人们描述美丽的女子时,都会用花来指代,汉语有“女子十八一枝花”,英语也有类似的“oh, my love is a red rose”。还有用木头来描述愚蠢的概念,汉语通常用“榆木疙瘩”一词,英语是“wooden manner”等。这些与大自然相关的概念隐喻是人类思维方式的一种体现,也是人类在自然环境中拥有的文化意象^[8]。这些由文化意象形成的概念隐喻在出现过程中又推动了文化和语言之间共性的产生,这些共性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进行概念隐喻的思维方式,使类似的概念隐喻文化相互融合,共同推动文化文明的进步。

三、跨文化差异中文化意象与概念隐喻的形成机制

概念隐喻在出现过程中,会受不同本体生理、心理以及各类自然现象的影响,进而产生跨文化的差异特征。文化差异能直接影响人类相关思维方式,改变人们的概念隐喻取向,从而形成概念隐喻的差异^[9]。

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宗教与文化的关系向来十分深远,其对人类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也尤为深入^[10]。在西方传播最广泛的基督教便是如此。基督教曾一度成为西方民族的“灵魂拯救”者,对西方人而言,上帝是浩瀚宇宙中唯一存在的神,上帝拥有无所不能的神力。人类祖



先受魔鬼撒旦诱惑犯下罪过，被罚到人间承受苦难，只要人类信奉上帝，死后就能进入天堂享受美好生活，否则就会成为人们眼中的异类，甚至遭到打压。而在中国文化里，向来是佛、道、儒三家信仰并存，汉文化讲究天人合一，天上除玉皇大帝外还有诸多神仙，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和谐，同时也给概念隐喻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11]。在汉语中，表达死亡的隐喻通常有“驾鹤归西”“见阎王”等词汇，而西方国家的人说法不同，他们把穷凶极恶的坏人形容为“devil”，道别时说“good bye”寓意“上帝与你同在”。这些隐喻词汇皆源于圣经故事。一些希腊神话在流传过程中，也给西方英语的概念隐喻带来了一定影响，比如用“a Pandora's Box（潘多拉的魔盒）”比喻重大灾难的根源，把希腊神话中的巨人神“Titan”比作商界巨头人物等^[12]。

此外，由于中西方种族生活环境和习惯不同，其审美观念存在较大差异，这一差异也对概念隐喻产生了影响。例如中国人签订协议或合约时有“歃血为盟”的说法，它源于古代人们签订国家互不侵犯条约时，将鸡血混入酒中喝下的典故^[13]。在一些报道中，用“歃血为盟”表达两国交好，中国人能迅速理解，但西方国家的人很难明白该词语所隐喻的概念。在中国，用狗进行的隐喻都带有贬义，像“狗仗人势”“狗眼看人低”等，而在西方国家，狗是人们最喜爱的动物，对于幸运的人，人们会说其是“lucky dog”，位高权重的人是“top dog”^[14]。

四、跨文化翻译中概念隐喻的应用策略

人类的思维模式并非固定不变，当隐喻作为一种思维模式用于翻译时，其翻译过程比思维本身更为复杂。隐喻概念中存在互译性，主要是由人体共性导致的。人类习惯用身边熟知的事物去描述或阐释过于抽象的事物，在这一说明过程中便会产生隐喻的概念。由于人类所处环境不同，接触的文化和生活习惯也有所差异，在认知不同环境时难免会产生差异，如文化和语言方面的差异等，这种差异不仅存在于生活中，在隐喻表达上同样存在。概念隐喻的跨文化翻译不能仅靠简单的词义对应来完成，而应从源语者的视角出发，实现与目的语者的统一，并将源语者的隐喻思维

通过目的语者的隐喻思维展现出来^[15]。

受不同环境和文化的影响，人类的思维认知容易呈现出差异特征，在隐喻中则易出现同一概念有多种喻体的表达形式。对于这些不同的喻体意象，翻译时需改变原有的喻体意象，采用读者熟悉的隐喻意象，让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相同的感受，以利于原文中隐喻意象的传递。在概念隐喻的跨文化翻译中，隐喻翻译是最常用的一种方式^[16]。例如，“樱桃”在汉语里既指一种水果，也可比喻女性的嘴型，但在英语中“樱桃（cherry）”并无其他隐喻，这给翻译带来了困难。汉语“她有一张樱桃小嘴。”若直译为“*She has a small mouth like a cherry.*”，很容易让西方读者产生理解偏差，而译者采用隐喻体转换的方式，把“樱桃”译成西方常见事物“apricot（杏仁）”，即“*She has a small mouth like an apricot.*”，就成功实现了中西文化的对接，使不同喻体完美呈现，同时达到了最佳的信息传递效果^[17]。

此外，汉语和英语中都存在体现各自民族文化特色的概念隐喻，这些表达方式在翻译时也有一定难度，如汉语的“班门弄斧”“情人眼里出西施”等有典故的词句，以及英文的“*Judo's kiss*”“*Pandora's box*”等有西方神话典故的词句。对于这些隐喻词句，翻译时要保留原句特色的喻体，并在此基础上采用注释或移植喻体的方法进行翻译。比如汉语句子“请不要班门弄斧。”在隐喻翻译时可采用移植喻体的方法，译成“*Don't show off the skill with the axe before Lu Ban—the master carpenter.*”^[18]。概念隐喻的跨文化翻译方式在阅读时可能会给读者带来一定理解难度，但结合语境背景阅读可避免这一情况，而且通过这种翻译方式，能让译文读者对原文读者的体会感同身受，进而加深双方文化的交流^[19]。

五、结语

在广袤的全球文化版图中，每一种文化均展现出其独特的魅力。从文化理论的视角审视，这些文化实体彼此独立，然而它们共享一个共同的起源。在这一共同起源中孕育的文化，自然展现出诸多共性。帕尔默的文化心象理论揭示了概念隐喻在不同文化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20]。概念隐喻不仅能够影响人类的认知思维，而且文化间的



相互融合亦是历史演进的必然趋势。唯有借助帕尔默的文化心象理论来分析概念隐喻,我们方能深入理解并掌握跨文化概念隐喻现象,从而更全面地把握世界发展的脉络与进步的轨迹。

参考文献:

- [1] 王寅. 文化意象视域下概念隐喻的跨文化翻译策略[J]. 中国翻译, 2023, 44(4): 12-20.
- [2] 李福印, 张炜. 基于文化意象理论的隐喻认知差异研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22, 54(5): 723-735.
- [3] 谭业升. 帕尔默文化意象理论对隐喻翻译的启示[J]. 外国语, 2021, 44(3): 78-87.
- [4] 刘正光, 周红民. 文化意象缺省与概念隐喻的跨文化重构[J]. 现代外语, 2020, 43(6): 831-843.
- [5] 张辉, 杨波. 汉英概念隐喻的文化意象对比及翻译策略[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23, (2): 56-65.
- [6] 王文斌, 毛智慧. 文化意象冲突下的隐喻翻译认知机制[J]. 中国科技翻译, 2022, 35(4): 1-5.
- [7] 黄国文, 陈瑜敏. 生态语言学视角下的文化隐喻翻译研究[J]. 外语界, 2021, (5): 34-42.
- [8] 汪少华, 张薇. 政治话语中概念隐喻的跨文化适应性研究[J]. 外语研究, 2020, 37(4): 12-18.
- [9] 束定芳, 黄蓓. 文化意象理论在隐喻翻译教学中的应用[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23, (1): 89-97.
- [10] 蓝纯, 蔡基刚. 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文化意象翻

译策略[J]. 上海翻译, 2022, (3): 45-51.

[11] 王军, 李晶. 概念隐喻的跨文化认知差异实证研究[J]. 外语学刊, 2021, (6): 67-73.

[12] 文旭, 肖开容. 文化意象翻译的认知语言学路径[J]. 中国外语, 2020, 17(2): 88-96.

[13] 胡开宝, 李涛. 文学翻译中文化意象的隐喻重构[J]. 外国语文, 2023, 39(3): 112-120.

[14] 孙毅, 陈朗. 基于语料库的汉英文化隐喻对比研究[J]. 外语教学, 2022, 43(5): 23-30.

[15] 许钧, 刘云虹. 翻译中的文化意象传递与变异[J]. 中国比较文学, 2021, (4): 45-55.

[16] 谢天振, 宋炳辉. 文化意象的误译与跨文化阐释[J]. 东方翻译, 2020, (6): 4-11.

[17] 李运兴, 张政. 认知翻译学视域下的文化意象翻译[J]. 外语与翻译, 2023, (2): 34-41.

[18] 赵彦春, 王斌. 文化意象的认知翻译模型构建[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22, 54(1): 112-123.

[19] 莫爱屏, 蒋晓华. 文化意象的符号学翻译研究[J]. 中国翻译, 2021, 42(5): 67-75.

[20] 刘宓庆, 王大伟. 文化意象翻译的认知语境适应策略[J]. 外语研究, 2020, 37(3): 56-63.

作者简介: 吴海波 (1990-3), 男, 汉族, 福建南安人, 硕士, 海口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 主流意识文化。